

闲话文人 姜炳炎  
汪曾祺读杂书



汪曾祺

俗话说：“读杂书万卷，不如读经典一卷”。杂书，在若干人眼里，是不屑一顾的，而当代著名作家和散文家汪曾祺却对杂书情有独钟。他在文章里，系统讲述了读杂书的习惯、分类、四个益处。

汪曾祺平时读书很杂，无明确目的，往往是随手抓起一本书就看，看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，就随手丢开。他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要多得多。

汪曾祺常看的杂书主要五类。一是节令风物民俗，比如南朝时宗懔所著《荆楚岁时记》，这是我国迄今保存最完整的一部记录岁时节令、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散文；北宋孟元老笔记体散文《东京梦华录》等。二是方志和游记，如唐代刘恂写的地理杂记《岭表录异》；宋代周去非所著地理名著《岭外代答》。三是草木虫鱼类，如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，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学专著《植物名实图考》，清代园艺学专著《花镜》等。四是讲正经学问的书，如清代钱大昕所著涉及经史、地理、典籍等诸多领域的《十驾斋养新录》，清俞正燮汇集经史、医理、方言等成果汇编的《癸巳类稿》。五是无法明确归类，如南宋著名法医学大家宋慈的《宋提刑洗冤录》，被誉为法医鉴定学。还有些书内容很庞杂，如《梦溪笔谈》、《容斋随笔》等，汪曾祺统称为笔记。

在读杂书的过程中，汪曾祺总结了四个益处。

第一，这是很好的休息，可以懒懒地靠在沙发里，看杂书一册，比打扑克要舒服得多。

第二，可以增长知识，认识世界。汪曾祺从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明白知了原来是是个聾子。从吴其浚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中知道古诗里的葵就是湖南、四川人现在还吃的冬苋菜。明白这些常识事物后，汪曾祺感到非常高兴。

第三，可以学习语言。杂书的文字写得比较随便、自然，不是正襟危坐，刻意为文，却别有情致，且接近口语。汪曾祺感到，一个现代作家如果从古人学语言，与其苦读《昭明文选》、唐宋八大家，不如多看古代的杂书。这样文辞比较容易溶入自己的笔下。汪曾祺建议青年作家不妨试试。

第四，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、写散文的道理，尤其是书论和画论。汪曾祺举例清包世臣的书法理论著作《艺舟双辑》讲：“吴兴书笔，专用乎顺，一点一画，一字一行，排次顶接而成。古贴字体，大小颇有相径庭者，如老翁携幼孙行，长短参差，而情意真挚，痛痒相关。”这里讲的是写字，汪曾祺悟到：写小说、散文也应当如此。小说、散文的各部分，应该“情意真挚、痛痒相关”，这样才能做到“形散而神不散”。

文学大家爱读杂书且受益匪浅，让我们感触和启迪颇多。固

渐远风雅 李树林  
建党邮票

我意外地在旧货市场淘到一枚建党邮票。如果没记错，应该和家里珍藏的那枚是一套。我匆匆回到家，找出那枚邮票，把两枚摆在一起，就像一对久别重逢的亲兄弟，果然是一套早年建党邮票。我欣喜不已。

我从小喜欢集邮，收藏了十几册各时期发行的纪念邮票。外甥求我送给他，我哪舍得。但受不了他天天软磨硬缠，见他喜欢摆弄照相机，我说：“你要我的邮票可以，但把你的照相机给我。”满以为他会就此罢手，谁知他爽快地将照相机拱手相让。我只好忍痛割爱，将邮票全部给了他。

一次，我整理书籍，在旧书里发现一枚建党邮票。往事浮上心头，那年我过生日，母亲悄悄给我3分钱。我一直想吃小铺卖的发面饼，刚好3分钱一个，买了没等吃，同学看着馋，愿用邮票换我的发面饼。其他同学也想得到这枚邮票，要来我家商谈。在他来之前，我将邮票单独藏到书里。后来，求学，上山下乡，返城参加工作，结婚成家等繁琐的生活，让我无暇顾及个人喜好。十几册邮票给了外甥，我一直耿耿于怀，发誓远离集邮。然而，旧书里的这枚建党邮票，让我如获至宝，爱不释手。

有一年“七一”，儿子所在学校要求学生，把家中与建党有关的读物及宣传品送校参展，我让儿子把建党邮票带到学校给他增光。活动结束，一位老师想留下邮票，被我拒绝。儿子不悦，说：“我不想让老师失望。”“难道你没想过，我失去它会有多失望？”我生气地说。

“在旧货市场发现这枚邮票时，我一阵惊喜。”我对老伴说，“花多少钱我都乐意。”

老伴半开玩笑，半认真地问我，是不是想重操旧业，继续集邮，日后好发财？

“如果说少年时集邮是为好玩。那么市场经济后，也盘算过我的那些邮票值多少钱。但如今，玩心和金钱似乎对我都不是最重要的了。”我颇为感慨地说，“只想珍藏这套建党邮票，方寸世界赞颂党的丰功伟绩，懂得珍惜今天的美好时光。”固

百味书斋 唐宝民  
我与《鲁迅全集》

对鲁迅先生及作品产生兴趣，是在初中时代，源于宋文元老师为我们讲解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这使我认识到了先生作品的博大精深；从那时开始购买鲁迅作品集，我买到的第一本鲁迅作品集是《呐喊》，是在镇上的书店里买到的，以后又陆续买到了几本。有一天，我问宋老师：“鲁迅的作品究竟有多少本？”老师说：“鲁迅全集二十来册。”那是我第一次听说《鲁迅全集》的事。后来又有一天，我跟一个镇上的同学去他家里，他爸是个领导，家中的书架上摆着马克思恩格斯等的全集，其中竟然有一套《鲁迅全集》！我数了一下，一共20本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的，很气派地立在那里，我爱不释手地抚摸着，心想：“什么时候我能拥有一套《鲁迅全集》该多好啊！”从那一刻起，《鲁迅全集》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，这种情结，伴随着我度过了整个的青少年时代。

去的情结，这种情结，伴随着我度过了整个的青少年时代。

我的大学是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一所三流工科院校度过的。进入大学之后，对鲁迅先生的兴趣更加浓厚了。学生是清贫的，所以，买一套《鲁迅全集》的想法还只能是梦想，但学校图书馆藏有《鲁迅全集》，我决定把它通读一遍。于是，便开始一本本地借阅、利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。记得那是竖排版的，读起来很费劲，但读多了就习惯了。就这样，我看完一本再看下一本，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，把《鲁迅全集》读完了。书是学校图书馆的，不是自己的，所以，还回去的时候，心中空落落的，彼时，就更想拥有一套《鲁迅全集》了。

当时，齐齐哈尔新华书店就卖《鲁迅全集》，我去看了好几回，都被昂贵的价格吓跑了——穷学生哪有钱买啊！齐齐哈尔小黄楼那里有个旧书市，我常到那里买书，经常能碰到《鲁迅全集》残本，我遇到就买，于是便产生了一个想法：既然买不起新的《鲁迅全集》，就常到旧书摊上转转，自己凑齐一套旧的吧！我为自己的这个想法很是高兴了一番，以后再到旧书摊，就格外留意，也因此搜集到了十来册残本，但后来发现，抱着我这种想法的人不少，但几乎没有谁能搜集齐全，因为《鲁迅全集》二十余册，能搜集全了十分不容易。所以，我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打算。

大学毕业之后，我留在齐齐哈尔工作，本以为工作了就有能力买《鲁迅全集》，但由于收入不高，加之那时住集体宿舍总搬家，所以，这个愿望依然没能实现。工作了几年后，我辞职开始到各地流浪，漂泊不定的生活，就更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了。再后来，我在北方的一所城市停留下来，成了一所私立专科学校的讲师，我的讲课内容，有一些就涉及到鲁迅先生，所以，我当时真的很需要一套《鲁迅全集》，但还是因着囊中羞涩，没能去买。倒是有一回，我在一家书店看书时，遇到了一套《鲁迅文集》，用盒子装的，共六册，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，定价一百多元，我和老板熟悉，他只收我一百元，我因此拥有了一套《鲁迅文集》。但这套书不是全集，只是鲁迅先生的文章精华本，所以，我的《鲁迅全集》情结依然挥之不去。再后来，我辞职做了专职自由撰稿人，我的写作内容，有相当一部分是和鲁迅先生有关的，于是决定把购买《鲁迅全集》的计划付诸实施。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午后，我骑着单车去了北方图书馆城，交了990元钱，买下了一套《鲁迅全集》。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的版本，一共18册，装了整整一个纸箱，我把箱子放在单车的后座上往家走，心中充满了自豪感。

从少年时代产生拥有《鲁迅全集》的梦想，到真正拥有《鲁迅全集》，时光竟然过去了将近20年！记得有一回，我在博客上晒书房照片，有一个文友留言说：“竟然拥有一套《鲁迅全集》！”那一刻，我非常自豪。固



读史侧翼 刘绍义  
包公没有嫂子？

一周前，伴随着秋风秋雨，又作了趟合肥之行。这次有幸腾出一天时间，尽情地游了一趟包公祠。

有历史系教授张老师以及正在读研的远房侄子作伴，再加上土生土长的合肥人老李作向导，着实让我过了把增长见识的瘾。

过去也来过几回包公祠，但大都是走马观花，只不过是看看周围的景色，赏赏包公的手迹，再读读两边的楹联而已。其他的，就没有留意过更深的内容。

但这一次，颇有点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的味道。当我听老李说包拯是父亲包令仪唯一的儿子时，着实惊了一回。包拯既然是独子，那他的嫂子是怎么一回事，待嫂若母的故事难道都是凭空杜撰的？

我不但听过京剧《赤桑镇》，也看过吉剧《包公赔情》，里面叙述的都是包拯自小由长嫂养大，对嫂子的恩情十分珍惜的故事。后因为侄子包勉为官不正，贪赃枉法，包公大义灭亲，铡了嫂娘的亲骨肉，从此让嫂子对自己有了私愤。后来，知道真相的嫂子深明大义，前嫌尽释，不但原谅了包拯，还亲自为陈州放粮顺道回家的包拯饯行。

听了老李的解说，又游了包拯墓的附葬区，才知道真相。原来包拯与嫂子的故事不是空穴来风，只不过后人敬仰包拯的为人，张冠李戴，将儿媳崔氏抚养小儿子包绶的故事戴到了包拯和嫂子的头上。这种善意的安排，符合大众的心理。这就是包拯和嫂子故事的来源。

附葬区内，长子包繇和长媳崔氏的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（包拯）晚得幼子绶，其母出，节妇慈养之为己子……当姑夫人捐馆舍时，绶犹孩童，节妇迎师教导之，以至成人，为择取良妇。绶事节妇如母，复立族子永年，为祝史嗣。”

崔氏到包府二年，，丈夫包繇就暴病身亡，二十一岁的崔氏生下的遗腹子包文辅又五岁夭亡，失夫失子的崔氏从此就一心一意地伺候起了公婆。包拯在嘉佑七年（1062）去世时，次子包绶才五岁，于是寡居多年的崔氏就担当起了抚养包绶的重任……

这一点，在包绶的墓志铭中也有相同的记载：“公有寡嫂崔氏，素以节义闻，公以母礼事之。”张教授说，宋史对这件事也有相关的记载。我回来翻了一下《宋史·包拯传》，里面确实有这样的说法：“拯曾出其媵，在父母家生子，崔密抚其母，使谨视之。繇死后，取媵子归。”

这次游览中，我发现不论是包拯的“宋枢密副使包孝肃公拯之墓”，还是长子包繇长媳崔氏的“宋奉义郎潭州通判包公繇节妇永嘉郡君崔氏之墓”，亦或是次子包绶次媳文氏的“宋朝奉郎潭州通判包公绶蓬萊县君文氏之墓”，以及长孙包永年“宋宣教郎知崇阳县事包公永年之墓”，他们都称“公”，正是这受人尊敬的“公”字，让崔氏抚养包绶之事栽到了长嫂抚养包拯的头上，这符合人之常情、民之常理。

公众就是这样，尽管有些恶事不一定是奸臣干的，诸如秦桧、严嵩，但人们喜欢把有些恶事都加在这些奸臣的头上；与之同理，虽然有些善事也不一定是清官做的，诸如包拯、海瑞，但人们也喜欢把这些善事都戴到这些清官的头上，这都是人们的好恶之心、爱憎之情使然。固